

# “世界主义，知识分子和文学研究”

——专访著名批评家布鲁斯·罗宾斯教授

刘雪岚

**内容提要** 作为一种哲学理念和政治文化思想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从词源上可追溯到古希腊文的cosmos（世界或宇宙）+polis（城邦或市民），它的基本思想是所有在地球上居住的人类，无论其政治或国族隶属何方，都应分享一种基本跨越了民族和国家界限的共同伦理道德和权利义务，所有的人都有责任去培育和改善、并且尽全力去丰富总体人性，应该彼此相爱，尊重差异。这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大同世界理想在当今全球化语境下，再次凸显重要意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文和比较文学系资深教授布鲁斯·罗宾斯（Bruce Robbins）是美国“新世界主义”（New Cosmopolitanism）思潮的重要代表，在此访谈中，他着重探讨了新老世界主义的异同，在此语境下知识分子的作用，以及世界主义视野下的文学批评新趋势。

**关键词** 世界主义 知识分子 专业主义 文学批评

**刘雪岚**（以下简称“刘”）：罗宾斯教授，我们就从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西方文论的有效性”高层国际论坛上的主旨演讲谈起吧。您在发言中讨论了“新世界主义”的概念，相比传统的世界主义，“新世界主义”是多元的、实证的和描述性的（plural、empirical and descriptive）。您可以再详细说说新老世界主义的异同吗？

**罗宾斯**（以下简称“罗”）：当然。我所谓的传统世界主义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道德理想。作为一种道德理想，人没必要在现实生活的时间、地点或人群中找到它。它更像是一种愿望。批评家会怀疑，人可能过一种大同世界的生活吗？世界主义的理想生活就意味着你将无差别地对待所有人的福祉；对待遥远的陌生人和国度，要像对待自己的爱人、家人、同仁，要像对待自己的社群、职业和国家一样。这理想的辩护者会说，具体践行或许会有困难，但它依然为我们提供了可以努力的愿景，因为世界上有太多不公正，人们总是把相关的、亲近的人的福祉置于远方的陌生人之上，甚至会对非亲非故的人干出很坏的事情来，比如发动战争，或采取对他们非常不利的经济政策，诸如此类的事情。关于传统的世界主义是否只是一种理想的争论从未休止。

很多人还在说，如果我们期待全球正义，就应该朝着这个理想努力。

我称之为“新世界主义”（New Cosmopolitanism）的理念并不常出现在哲学领域。唯一的例外可能是安东尼·阿皮亚（Antony Appiah），他是个哲学家。他在上世纪90年代写过一篇文章，叫《世界主义的爱国者》，在文章中他以自己的家庭作为例证。他们一家来自非洲的加纳，他的父亲是个极度热爱加纳的爱国者，同时也是个世界主义者。阿皮亚是个哲学界的例外。我归之于“新世界主义”的其他人，多数都来自文学批评、人类学、社会学等与文化相关的领域，还有媒体和艺术史等领域。值得一说的，就像阿皮亚所强调的，在世界主义和爱国主义或民族主义之间，没有必要存在矛盾。如果你不把世界主义当作漂浮在人类日常生活之上的一种理想，而是产生于地球上不同社会中的一种东西，它可以被审视、也可以被检验。当人们开始迁移流动，当他们具有多重归属，当人们经历了不止一地的经验，具有了超出一个地方的忠诚感，也许他心中对于此地和彼地的忠诚感之间就会产生摩擦。这种摩擦会创造出一种新的、具有哲学意义的东西。世界主义可以有多种，而非只有一种。它不只是一种道德理想，也是人们在现实中可以切实去践行的。你可以审视它、探究它、还可以在各种情境下寻找它。所以就像你说的，我把世界主义定义为描述性的、实证的、多元的。另一种界定方式是“世界主义也是形容词化的”。世界主义不是一个孤立名字，而是有形容词修饰的名词。

**刘：**您在描述传统的世界主义时，也使用了一些形容词。比如说它是单一的、规范性的（singular and normative），而新世界主义是描述性的。您可以再具体说说什么是规范性的和描述性的吗？

**罗：**好的。当我说传统的世界主义是一种理想，我就是在说它是规范性的。就是说人必须按照某种既定方式行事，才能达到这种理想的要求。也就是说人不能厚此薄彼，只对身边的、亲近的人好而不对远方的、陌生的人好，也不能只对自己国家忠诚，而不对其他国家忠诚。这种传统的世界主义形象经常使爱国主义者或国家主义者感到恼火，因为他们觉得世界主义者就是些不关心自己的国家、只追随时尚的人。他们有着很讲究的品味，喜欢法国红酒、意大利服饰和瑞典设计。这暗示着世界主义者是一群非常非常小众的精英分子，对于时尚很敏感，他们不在乎国家，只在意最好的东西，也愿意炫耀他们懂得其他地方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刘：**照这么说，能否把“世界主义者”描述为“装饰性”（decorative）的？

**罗：**是的。审美的、装饰性的，对现实生活没有真正的意义。所以在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一个负面的词汇就是“无根的世界主义者”，意思是他们到哪里都没有扎

根。但人是应该有根基的。所以用于描述“新世界主义”的一个词汇就是“有根的世界主义”，听上去有点自相矛盾，但意思就是即便生活在不同的地方，人也可以有根。人不是植物，植物在这里生根，在其他地方就不行了。

**刘：**这就是您一再强调的，在人的归属感及其世界主义理念之间，不是必然存在着矛盾冲突。

**罗：**完全正确。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有冲突，但不是必然的。所以在描述性的、实证的、多元的这几个形容词之外，还有一个形容词也很重要，那就是：民主的（democratic）。世界主义的理念正在变得更加民主，它不再只属于那些骄矜于懂得最好的法国红酒的精英分子。就像以前说法语或其他什么语言，可以被当作一种文化资本，现在那些不矫揉造作的、对时尚不懂行的、不背弃对自己国家的忠诚的普通人，他们也可以是世界主义者。

**刘：**在您谈论老的或传统的世界主义作为一种理想时，您有时会追溯词源到古希腊时期，您提到古希腊哲学家第欧根尼（Diogenes），还有其他一些晚期哲学家。他们的实践能称为“实证性”吗？在过去还有哪些例子？

**罗：**哦，这是个好问题。第欧根尼是个怪人，他不追随任何人，实际上他是个非常非常强的个人主义者，他不遵守任何地方的任何习俗。他其实来自于一个希腊殖民地，他并不是雅典公民。他以赤身裸体行走在街上而闻名，还有各种关于他的传说，比如他跟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他睥睨一切，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平头百姓。他被称作“犬儒的”，这个词来自希腊文，是狗的意思，“犬儒”就是像狗的哲学，所以他不从属于任何群体。在这个意义上，他更像是传统世界主义者的楷模。对任何权势都不说，不归属于任何地方。如果你可以不遵从任何地方的任何习俗，你的确可以赤身裸体，也可以露宿街头，第欧根尼就是这样做的。若论及古希腊时期的人，能够集体践行世界主义的生活方式的，我想应该是那些斯多葛主义者。对于他们，我所知不多。斯多葛派实际上有众多的追随者。黑格尔就十分倾心于此，但他同时也在竭力抗拒这种吸引。他在1806年写作《现象学》时，就认为斯多葛主义就是假设你不用反抗主人，不用反抗那些封建领主，你也能获得自由，你可以在头脑中是自由的，然后说我的身体无关紧要。斯多葛主义者说，你可以随意处置我的身体，我不在乎，因为在精神上，我是自由的。黑格尔十分喜欢这个说法，但他同时也在抗拒它。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种奴隶哲学，就是说现实中你虽然是奴隶，但是不用通过革命，你也可以在内在精神上获得自由。但也有些非常有权力的人，认为自己是斯多葛主义者，就像我在发言中提到的罗马皇帝马可·奥勒留。所以并不能简单称之为奴隶哲学。就像在

认识世界主义的时候，无论是新还是旧，也存在这样的问题。人们在把世界主义当作一种理想时，经常认为这是有权力的人的信仰，因为它经常跟帝国联系在一起，所以不能说这是弱者、穷人、或者无权无势者的哲学。此外，很多人都会说世界主义就是美国这样的超级大国的世界观，这种说法不断被重复。当然美国人希望对哪里都有种归属感，因为他们想属于全世界，他们想在全世界任何地方都强大。

有一本重要的书，是提摩西·布伦南（Timothy Brennan）的早期著作，是关于萨尔曼·拉什迪的第一本论著。布伦南是萨义德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这本书是以拉什迪为例来谴责世界主义。他所说的话就是通常用来批评国际性作家的话。大家都觉得拉什迪这么出名就是因为他迎合西方，出卖自己。世界主义就是宗主国一方对于那些迎合西方或美国、出卖自己灵魂的人的赞赏。关于世界主义的争论如今依然很激烈。在东亚也有类似的例子。在康奈尔大学有一个很出色的日本学者，叫酒井直树（Naoki Sakai）。他写过一篇文章，讨论上世纪30年代日本哲学的转向。他说日本哲学原来一直是相当狭隘的民族主义的，后来准备建立亚洲帝国时，很多世界主义者就说在日本，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是有关联的。他们说世界主义就是多元化，我们也欣赏中国、越南和印度文化。在新的帝国，在即将创造的新框架里，每种文化都有容身之地。所以，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有时可以产生非常危险的关联。

**刘：**世界主义有时候就是戴着面具或伪装的民族主义？

**罗：**这其实还是国家主义，认为一个国家才是最大的施惠者。这也不全是谎言，对吧？这种哲学一直伴随着帝国集体主义。再回头看亚历山大大帝，他以欣赏希腊之外的文明而闻名，但他也征服了那些他欣赏的文明。所以说，一个世界主义的信徒，他的世界主义也可以是跟帝国征服并行不悖的。

**刘：**这就是为什么您也经常质疑世界主义，譬如说它的动机……

**罗：**是的。我认为对于世界主义的每个实例，都要始终质疑它的动机。你不能仅仅把它当作理想。因为在现实中，一种理想也可以扩张某个国家的权势。不过我也不能说，世界主义就是当权者征服其他国家的诡计。

**刘：**在您列举的对世界主义的怀疑之外，对于世界主义者也有些质疑，无论是新的还是传统的。有个叫詹姆斯·克利福德（James Clifford）的美国作家和批评家，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游客或旅行者不是世界主义者，因为他们无法参与到旅游地的具体事务中；流亡者也不是，因为他们是被迫进入流放地，不是主动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而移民们，因为常常被生存所困，也不能被算作世界主义者。世界主义者通常是知识分子或专业人士，但他们又很容易演变成精英或特权阶层。我知道您曾多次区分或争

辩说世界主义者不是必然的特权或精英阶层，他们也可以是爱国和民主的。世界主义当如何面对这种疑问，又如何能防止其演变成特权和精英的可能？

罗：我从几个角度谈吧。首先说说詹姆斯·克利福德。他是人类学历史学家，也是“新世界主义”的最重要的理论家之一。他尤为坚持“新世界主义”的民主性，认为非特权阶层的人民都可以是世界主义者，譬如18、19世纪时那些仆从、翻译和探险家的向导们，他们才是欧洲世界主义者的典型代表。克利福德对于当地居民产生了极大兴趣，他们领着欧洲探险家们到处转，他们自己通常也是聪明灵活、经验丰富的，他们可不仅仅是当地居民而已。克利福德说除了那些探险家，向导们不也可以被看作是世界主义者吗？我认为克利福德说的非常对，他摒弃了那种世界主义者首先应该是个知识分子的说法，对我是一个巨大的启发。知识分子通常都是享有特权者，就像那些18、19世纪的探险家们。但克利福德要表达的就是，我们不要把世界主义当成知识分子的专利。不过我可能比他更关心知识分子问题，虽然上世纪90年代就是他鼓舞了我，他对于新世界主义的民主性思想也持续给我启发，但在上世纪同一时期，我也在探讨有关知识分子和专业主义的问题。我以为尽管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享有某些特权，这是历史事实，但依然需要跟他们对话，也许他们并非特殊族类。有时候也需要区分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不过那是另外的话题了。

在美国的文学研究领域，我不知道中国的情况如何，有一种自以为是的趋势，那就是一定要倾听苦难的或者弱势人民的声音，或以他们的名义，这样你就获得一种道德纯洁感。你会说看X群体的人民是多么苦难，我要谈论他们的文学，因为X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被剥夺的，都是社会不公的受害者。尽管我自认为属于左翼，但对于一些文学评论家拥抱道德纯洁的冲动，我总表示怀疑。他们装作自己无权无势，躲在劳苦大众的苦难背后，观察他们在道德上是否纯洁，因为他们是受害者。在美国，对于受害者有过多的认同。但这种态度是不健康的，我认为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是应该承认我们所拥有的地位；在教育、培训和体制方面，我们是有某些特权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是坏人，总想维护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其实我们只想让世界变得更公正，要想实现这一点，或许就得从承认我们拥有权力和特权开始，然后利用它来做事。

所以这种“用它来做事”的思路促使我写了一本关于专业主义的书，那时候每个人都把专业主义说得很糟糕。在那些把知识分子理想化的人看来，专业人士和知识分子的最大不同就是专业人士会向体制妥协，但知识分子不会。知识分子是自治的、独立的，有点像第欧根尼。他们可以象征性地裸睡在浴缸里，也可以英雄般在外面游

逛，完全无视当地的所有习俗和制度。在刚开始研究知识分子时，我就说过这纯属胡言，人根本不可能这样生活，这只是一种任何人都难以实践的理想。所以我们还是忘记知识分子可以完全独立的理想吧。这么说也有点棘手，因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对很多人有巨大吸引力，有些我在这个世界上最尊重的人就很倾心于这个理想，比如说爱德华·萨义德。他在讨论知识分子时，就把他们看作流亡者，好似被放逐在一切之外。

**刘：**有时即便身处中心，也要表现得像自我放逐的流亡者。

**罗：**完全正确。所以萨义德对于知识分子的理解就是流亡者，这使知识分子具有了英雄色彩，让每个人都想成为知识分子，或者暗暗自诩为知识分子，因为我是独立的。在这点上我从来没有认同萨义德。他非常非常反对专业化和专业主义。我只有一次鼓足勇气（因为他是我的老师，还非常有名，呵呵）对他说：“爱德华，如果专业人士像你说的那么糟糕，为什么他们会把你当成楷模呢？如果他们完全对制度妥协，出卖自己，他们会真的把你当英雄吗？”他并没有回答我。不过这也许就是回答吧。我始终坚信一个人没必要完全将自己放逐于世界之外，也不必声称独立于所有事情之上，才能有效地斗争、推动世界更加公正，或者自由地思想。

**刘：**接着这个话题，我正想跟您讨论知识分子的问题。您有两本书都与此有关。《世俗的使命：知识分子、专业主义和文化》（*Secular Vocations: Intellectuals, Professionalism, Culture*）和《知识分子：美学、政治与学术》（*Intellectuals: Aesthetics, Politics, Academics*）。您探讨了专业化人士和知识分子的异同。理查·波斯纳的《公共知识分子的衰落》也被翻译成中文，他在书中分析了造成美国知识分子群体衰落和被体制化的一些原因。您如何看待在世界主义情境下知识分子的状态和作用呢？

**罗：**在《世俗的使命》中，我为专业主义说了些好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总认为从前知识分子的状态是理想的、是独立的，那么你现在看到知识分子好像没那么独立，他们当然就是衰落了，不是吗？不过这是胡说。人们每次写知识分子，都要说他们衰落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他是从一种理想知识分子的假想出发，然后对照现实，不管何时何地在那个国家，总是同一个故事，哦，天哪，知识分子衰落了。因为知识分子从来就不曾完全独立过，所以每次都显得他们衰落了。我就是这么看待所谓衰落故事的。波斯纳的版本不过是成百上千老套的衰落故事之一罢了。

**刘：**我记得在美国还有拉塞尔·雅各比（Russell Jacoby）写过《最后的知识分子》，安德鲁·德尔班科（Andrew Delbanco）写过关于美国大学里人文学科的衰落。

这些也都算是所谓的“衰落叙事”吗？就像“作者之死”、“小说之死”一样？

**罗：**哦，我并不认为所有的“衰落”或“死亡”故事都是错的。只是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是错的。作为解药，我想给你推荐一本非常有趣、非常好的书，它是非常文学的，你们的读者应该会喜欢。就是斯蒂芬·科里尼（Stefan Collini）的《心不在焉》（*Absent Minds: Intellectuals in Britain*）。心不在焉是个笑话，因为我们老是讲心不在焉的教授和心不在焉的知识分子的故事。科里尼跟我一样，都强烈地感到“衰落叙事”有很大的问题。他是个历史学家，他做很严肃认真的考察，他还发现了“消失的知识分子”的故事。在不同的时代和地方，都有相同的“消失的知识分子”的故事。此外，我不记得科里尼是否也说过，就是那些大讲知识分子衰落故事的人，多数关注的是白种男性。他们并不关心女性，或者有色女性，她们同样是知识分子，可能更多关注的是女性和少数族裔的问题。但她们不是白种男人。所以当那些人环顾四周，看不到那些位置被白种男人占据，就说知识分子都消失了，他们说的不是知识分子，而是白人男性知识分子。现在当然还有很多白人男性知识分子，只不过他们不再是唯一的知识分子。所以我还要推荐柯乃尔·韦斯特（Cornel West），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熟悉他的名字。他是美国目前最重要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实际上就是他在1984年邀请我加入《社会文本》（*Social Text*）杂志的。他是非裔美国人，还是个牧师。他既是大学的哲学教授，也在教会有一席之地。他一直致力于反抗现状，反对歧视黑人，甚至批评奥巴马对于种族问题的忽视。当然这有点讽刺，因为奥巴马是美国第一任黑人总统。但就因为他是黑人总统，反而不能对种族问题太过关注。他要关心所有的白人，因为他们担心他会只关心黑人。

不过，知识分子的状况也的确受到影响，因为总体的学术环境都受到威胁，因为政府对于图书馆、大学和出版的资助都减少了。至少美国的图书市场没有以前那么繁荣，这也使得知识分子的处境变得艰难，不过现在很多知识分子的活动都转到网络上去了，有很多高水准的写作和阅读，反而规避了以前的监管和控制。

但在人文学科的经费被削减的同时，也应看到有些并不是衰退，而是有些学科被重新划分，改了名称。你可能学的是相同领域的知识，但学科名称换了。当然美国的经济停滞也是不争的事实，目前似乎有些好转，但我不知道是否会持续。年轻人可能计划想学些能给他们带来富足生活的知识，但我们的课程只能满足他们的灵魂需求。他们可能需要选修别的专业才能赚钱谋生。

**刘：**我记得您写过一篇文章叫《乔姆斯基的黄金律》（“Chomsky’s Golden Rule”），好像您不是非常赞同他的做法。乔姆斯基大概是美国最著名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吧？

但也有人指责他对自己发表评论的很多领域并不熟悉，是这样吗？

**罗：**哦，我应该重读下自己的文章再回答你这个问题，因为那是五年前写的了。不过我大致记得是说乔姆斯基是个彻头彻尾的、顽固的普遍主义者（Universalist），无论是他的语言学还是他的政治主张。他现在是美国最知名、最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部分原因就是属于传统意义上的世界性普遍主义。他在揭露美国的行径时最擅长的就是使用普遍主义原则。例如美国人总认为我们在别的国家建立军事基地是对的，乔姆斯基就会问：“如果有其他国家也想在美国建立军事基地，我们作何想？”当然你要想问这样的问题，就得是个普遍主义者。“黄金律”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乔姆斯基能这样发问当然是非常好的，但我的意思是，一个普遍主义者应该对所有涉事方都一视同仁，黄金律要适用于所有人。但乔姆斯基很少批评其他国家，永远都是美国的错，永远。所以我说，这可不是世界主义。

此外你知道，法国哲学家萨特说过知识分子的定义就是专管闲事的人。他指的就是知识分子参与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公共事务。这或许不是个准确定义，但包含某些真理。知识分子的确有别于某个领域的专家或学者，就像爱德华·萨义德，他不是中东问题专家，也不是政治学家。他参与巴以问题就是以公民的身份，他的内心告诉他发声。他这就是管闲事，这并不是他的专业领域，他是个文学批评家，所以可能有人就会说，他也不是研究这个或者那个领域的，他懂什么？乔姆斯基遭指责也是同样情况，尽管我知道他每次都很认真“做功课”。虽然他会犯错，但每个人都会犯错。作为知识分子，他的天职就是管闲事。

**刘：**这个回答太好了。在中国，目前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也很多，频频出现在媒体和电视上。有时候就会被指责不懂装懂、误导大众。看来萨特的定义或许可以解决公众对于公共知识分子的误解。

**罗：**哦，关于知识分子，让我再补充一下。你知道在我那个年代，有两套关于知识分子的术语影响最大。一个是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和“传统知识分子”，另一个是福柯的“通才知识分子”和“专业知识分子”。福柯认为世上已无通才型知识分子，每个人都是专才。他的典范恰好是萨特定义的反面。萨特说知识分子就是专管闲事的人，福柯则认为专才知识分子参与的恰是他专业领域的事务。这跟我讨论的专业化有异曲同工之处，就是说不必跨出专业领域就可以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这跟我前面说的萨特定义有点背道而驰，不过我觉得两种都有道理。

**刘：**现在我们谈谈世界主义跟文学的关系吧。当下有不少中国学者也在热议“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在中文里，Cosmopolitanism和World Literature，都分享了同



一个汉语词“世界”，但世界文学的“world”和世界主义的“cosmos”，意义并不相同，不过这两个词语却被频频联系在一起。你也写过关于“世界文学”的文章，能说说这两者的关系吗？

**罗：**哦，那篇文章其实是命题作文，而且是在表达我对“世界文学”这个概念的一些怀疑，当然我对世界文学的兴起也表示欢迎。我还讲授一门课，也大致可以描述为“世界文学”，所以我并不反对它，不过仅此而已。在美国，对于其他国家的文学，尤其是欧洲之外的文学，现在都被归于“后殖民文学”。“后殖民文学”是个非常粗略、不准确的概念，对中国就不适用，因为中国从来就没有被完全殖民过，对于土耳其、埃塞俄比亚等不是欧洲殖民地的地方，也不适用。而且它研究的文学也不一定是关于殖民主义的，所以“后殖民”这个术语是有问题的。“后殖民”是含有政治色彩的，对这类文学感兴趣的人是在关注世界范围的不公。如果是“世界文学”，就未必要有这种关注。选修“世界文学”课的学生们可能学习的是跟“后殖民文学”课一样的文学，他们也许完全没想过世界正义的问题。他们可能只是简单地想，哦，不错。这就像逛超市或商场，里面有不同国家的产品，我可以选这个国家生产的手袋或那个国家生产的鞋子，这选择可以没有任何政治色彩。“世界文学”使这种超市购物式的选择成为可能。不过假若当初驱动我阅读世界文学的那种兴味完全消失了的话，我并不感到愉快，也许有人会觉得这样更好。

**刘：**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国际高层论坛发言的第二部分是“暴力的再现”（the Representation of Atrocity），是从世界主义来探讨文学的。我们是否可以说世界主义为文学批评提供了新视角，或说世界主义已成为文学和文化研究的新潮流？

**罗：**“世界主义”这个名词的确被频繁提及，但我不认为它已经成为文学方法论，它也不会取代文化研究成为新流派。当然如果你看看美国“现代语言学会”（Modern Language Association）的会议议程，就会发现“世界主义”出现在很多小组讨论的题目中。就像我说过的，在讨论人们的身份杂糅及其广阔的经济、政治、甚至军事背景时，世界主义作为一种认知框架还是有用的。

**刘：**那世界主义可以用来探讨经典文学和作家吗？我看到有使用世界主义来研究西方经典作家，如亨利·詹姆斯和乔治·艾略特；或者像你做的那样，研究托尔斯泰的某些作品。

**罗：**哦，当然。我还希望世界主义能适用于研究中国早期文学，因为“后殖民”是完全不相干的。我想那时候中国还不是一个民族国家，我不知道你们怎么称呼自己，是帝国吗？不管怎样，中国跟邻邦都会有很多往来和联系。那时候人们还没有民

族国家意识，这是个现代名词。所以有不少学者使用“世界主义”来描述现代之前或早期现代时期的文化。有位印度作家叫阿米塔夫·高什（Amitav Ghosh），他就描述了民族国家出现之前的印度和欧洲的交流。也有非洲作家书写了非洲和其他地区，或者非洲大陆内部的相互联结。我相信亚洲也有这样的探讨，就像古代丝绸之路，有许多相互的交通和内在联系。

至于讨论西方作家，詹姆斯的世界主义早就是研究的话题，因为他的经历很特别，从小就被带到欧洲生活，学习多种语言，在那里接受教育，最后定居国外。他基本生活在美国之外，用世界主义来描述他很正常，而且是那种传统的、富有的、有特权的、精英的世界主义。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创作的文学就不好玩。乔治·爱略特或许会用“世界主义”这个词，不过我觉得她是反对它的，她表达过她的疑虑，她说让我像关心自己的同胞一样关心远方的陌生人是不现实的。不过她跟世界主义的关系比简单反对更复杂些。比如她反对过鸦片战争，不是直接表达的，是间接说的。很多学者在挖掘这类间接的表达，我们不是从她的小说中读到这些的，是从她的其他写作中读到的。我对于这种挖掘性研究也很有兴趣。

**刘：**非常感谢您，罗宾斯教授。我想您精彩的见解和阐述一定会对我们的读者大有启发，让我们能够更准确、更全面地了解世界主义及其相关议题。再次感谢。

（此访谈的英文原稿经罗宾斯教授审阅，中文版有删减。）

作者单位：中国社科院外文所

责任编辑：苏玲